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何以副刊

副刊不副 可寄山河



王小柔

我第一次和报纸副刊打交道时,还是个学生。

稿子是写在稿纸上的,一笔一画,投进邮筒,然后就是等。那时候的等待是有形的。每天翻报纸,目光先越过要闻、越过时事,径直落到最后一版。发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我把那一版剪下来,纸边裁得整整齐齐。

这张剪报的分量,不是可以有几十块钱稿费,而是在告诉一个年轻人:你写的日常,你的思考,是值得被郑重印出来的。后来我进了报社,职业生涯和副刊无缝衔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从投稿的人,变成看稿的人;从在副刊找自己名字的人,变成替别人安顿名字的人。

新闻版面回答的,是“今日发生了什么”,副刊回答的,是“我们在思考着什么”。

如今谈论副刊,多少需要一点勇气。手机屏幕上,15秒一条的短剧、刷不完的热点与反转,几乎把阅读切成了碎屑。有人说,报纸都快进博物馆了,副刊不更是版面的补白?恰恰相反。刊而名之以“副”,并非因其轻,而是因其柔。文学之美、生活之趣、思想之韵,抵达一般新闻难以抵达的心灵空间。

我对副刊的感情,从一份私人的感激,渐渐沉淀为一种职业的确信:副刊从来不“副”。它是一张报纸的体温,一条文脉的渡口。

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有一半是报纸副刊铺就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晨报副镌》扶植起从边地走来的沈从文;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一改闲适面貌,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老舍等先后在此留下笔墨;《大公报·文艺》由沈从文主持,成为京派论艺重镇。一部新文学史,许多章节最初就排印在报纸的版面缝隙里。

1949年3月24日,天津解放不久,郭小川、方纪、孙犁等亲手创办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七十余年间,它历经风雨,1979年1月4日复刊,至今已出刊三千余期,是当代存在持久、仍在创造纪录的报纸副刊之一。

孙犁先生一生做过编辑、教员、写作三种工作,编辑生涯最长。1983年“文艺周刊”出刊一千期之际,他写下《我和〈文艺周刊〉》,留下五条期望:园地永远是苗圃,不断扩大新作者队伍;地方报副刊也要办出自己的风格;坚持现实主义,重视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的作品;对作者既热情扶植又严格把关;编辑要提高修养,常联系作者,不能守株待兔。这五条我年轻时反复读过,至今仍字字落在纸面,也落在肩头。

副刊的苗圃属性,不只是成就几位写作者,而是为民族、为城市持续供养文学火种。文脉赓续,正因此一代一代,在版面上完成交接。

1951年,15岁的刘绍棠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维熙后来回忆,“从我的第一篇小说一直到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除一篇外,都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韩映山、房树民紧随其后,文学史上被称为“荷花淀派”的作家群,竟是从一张地方报纸的副刊里“长”出来的。

靠一个副刊的力量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这在当代文坛,不敢说绝后,至少是空前的。

孙犁还说过一段话,我办版时常拿来对照自己:“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一个“敢”字,道尽了副刊编辑的担当。副刊不是来稿的收纳筐,编辑手里的尺子,才是版面的风格。

1979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复刊后,孙犁虽不再到编辑部上班,却仍是幕后军师:重要的稿件,编辑要送到他家里请他定稿;重要的作家,他一封一封亲笔写约稿信。名家之大,肯俯下身来做编辑的细活,这是中国副刊的传统。2002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以孙犁的名字命名了全国报纸副刊编辑的最高奖。一位编辑,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尺,这是副刊人共同的荣光。

新闻讲究时效与准确,副刊讲究气韵与格调。副刊讲究慢。慢不是拖沓,是把细节捋顺,把情感打通,给思考留一块沉淀的地方。一定意义上说,副刊编辑是一座城市审美趣味的守门人。孙犁办副刊,坚守的是“荆钗布裙”、朴实无华的风格;我们这一代人守的,或许是碎片化、喧哗里文字最后的体面。话虚了要删,情浮了要压,见识浅了请作者再想;有生活、有嚼头儿的文字,才值得用宝贵版面托举。

孙犁先生当年编刊物,稿子再短也认真保存。他叮嘱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做杂家,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否则改稿会改出笑话。审美不是虚无风雅,而是具体取舍:让什么文字上版面,就是让什么趣味进入千家万户。

副刊给一个人的,还有文字自由驰骋的空间。我在报纸副刊写过“小柔杂谈”专栏,后来被评为媒体名专栏。我写的不过是天津人的市井日常、家长里短、会心一笑,慢慢磨出“把日子过成段子”的风格。也正是在副刊这个栏目的鼓励下,我陆续写出四十余部书,跻身作家行列。说这些并非自矜,我想说的是副刊育人的道理:一个普通人的观察与表达,若有一块园地长久容得下、托得起,这个人就能长成自己的样子。副刊成就作者,作者也反哺副刊,这是双向成全。

后来我编读书版、做文化采访,有了更多机会和文坛名家坐在一起交流。约王安忆老师聊她笔下的弄堂与女性心事,谈陆天明老师笔下的时代洪流与公仆书写,一来二去,文章写成了,交情也结下了。我们这一代副刊编辑,通讯录里记满这样的名字:他们信任这张报纸的版面,也信任版面背后那双改稿的眼睛。约稿要登家门、访书斋,听他们讲创作甘苦;稿子来了,既尊重名家笔锋,也守住版面尺度。副刊由此成为桥梁:桥这头是作家的思考,桥那头是千万读者的精神生活。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就在这样的往来浸润中一点点涵养出来。

国内历久弥新的名副刊,无一不是地域文化窗口:《人民日报》“大地”心系万家烟火;《解放日报》“朝花”记录海派百态;《羊城晚报》“花地”扎根岭南市井;《湖南日报》“湘江”浸润三湘风骨。一报一韵,副刊就是城市逸出的文化名片。



『小柔杂谈』专栏报影



『笑岔气儿』专栏报影

地方副刊的可贵,在于它写的是“我们的日子”。读者翻开版面,看见楼下那棵树、常去的那家老馆、记忆里的那条街,心里便生出亲近与认同。城市在更新,高楼取代旧巷,老街改头换面,许多人事转瞬无痕;副刊把它们记下来、写成活的文字,纸页翻过一代又一代,城市记忆便有了存根。

副刊不是守旧的代名词,它向来贴着读者的脉搏走。早年,我曾经工作的报纸副刊推出《晨辉在线》版面,那是中国平面媒体中第一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版面。那个时候正是即时通信软件刚兴起的年代,网络潮水初涌,我们没有把版面当成后院自留地,而是主动跨过网络,把读者拉到版面跟前来。读者在网上探讨当下热点话题,编辑在版面上回应、接续、升华,一个版面的距离,就这样把报纸和读者连成实时对话。这是副刊的一次自我革新:媒介可以变,与读者相连的那根线不能断。

副刊与时俱进,向来贴近读者对知识、感悟、消闲的需求,并把这些需求往更高处、更深处引。

有人问,现在报纸都没人看了,副刊还有用吗?其实,变的只是渡口,渡的还是人。

碎片时代尤其需要副刊这样的版面。相对于轻量化的快推送,副刊重一些,多了沉淀中的咀嚼;相对于碎片化的散阅读,副刊整一些,多了全貌中的思考;相对于可视化的速传播,副刊缓一些,多了理性中的蕴藉。15秒的短剧制造即时亢奋,过后什么也留不下,而一篇让人在午后静下来读的文章,却能把某个念头留在心里许多年。

我认为,信息可以瞬时抵达,思想不能瞬时生成;情绪可以批量制造,美感只能慢慢涵养。副刊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这个时代保留一处可以慢下来、静下来、想一想的精神空间。

这也是党报副刊不可替代的职责。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媒介形态千变万化,这个使命始终不变。副刊不追逐热点流量,却能沉淀时光质感;它不渲染宏大场景,却能涵润世道人心。把中华文脉接过来,把时代气象写进去,把一城烟火的温度留住,把万千读者的心事安放好,这就是副刊气韵生动的样子。

守正创新,守的是内容品质的“正”,创的是表达方式的“新”。副刊不拒绝流量,只是不肯被流量劫持,我们也在做着各种尝试,比如版面可以拆成推文,专栏可以变成音频,编辑的眼睛和手艺,走到哪里都是稀缺的。越是这样的时刻,副刊越显出自己的分量。

当所有的内容都在抢你的注意力,副刊在乎的是你的心。它不追着你跑,它就亮在那儿,像报尾的一盏灯。人民网的评论说:副刊居报尾而向潮头,以滴水穿石的柔韧,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文化趣味与世道人心。

纸页虽轻,千钧可任;副刊不副,可寄山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日报》副刊记者,出版文学作品四十余部。)

沽上丛话

南美行纪(七)

巴拿马:古城与运河

薛冰



蓝宝石公主号邮轮在巴拿马城港口停泊一天,乘客可以上岸自由活动。说是自由活动,外国旅游者是真的自由,一个人或一家人,背个双肩包就上岸了。我们还是要跟着导游,找到地陪,乘旅行社安排的大客车集体行动。

上午8时下船出港,去游巴拿马城。进城的路基本与巴拿马运河平行,绿荫间隙不时能看到清亮的水面。河面不宽,让我想起扬州的大运河。听地陪说,巴拿马运河最宽处约300米,最窄处只有最宽处的一半,水深13米到15米。我们擦过新城区,先去游览世界遗产巴拿马古城的遗址部分和历史城区部分。遗址部分又称第一古城,此地原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渔村,“巴拿马”即印第安语“渔村”之意。西班牙航海家巴尔博亚1513年来到这里,1519年,西班牙派遣的巴拿马总督达维拉在此建城,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巴拿马城成为欧洲殖民者掠夺美洲财富运回国的转运站。财富引来了海盗,1671年,英国私掠者亨利·摩根洗劫巴拿马城,城池随后起火,只有教堂钟楼、修道院等几幢大型石构建筑残存。一大片空旷的绿地中,当年宏伟规制的残垣格外醒目。教堂废墟内的方柱形钟楼尚完整保存五层外壁,沿着现代旋转扶梯攀登,从残破的窗洞中观看外面的风景,有如万花筒,断垣残壁随着角度与高度而变幻,登上顶层可以俯瞰全城风光,遥望太平洋。门窗都有防护措施,并注意不对古建筑本体造成损伤。遗址旁有古城博物馆,规模不大,以图表、图片形式介绍城市历史,还展示部分出土文物,主要是建筑构件和教堂圣像、圣画等。

我们的地陪小孙,18岁去阿根廷上大学,毕业后留阿就业,中巴建交次年即来巴拿马创业,现为旅行社合伙人。他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密切,他的讲解水准高,巴拿马的全面介绍,重点景观的来龙去脉,条理清晰,表述严谨,不像有些导游插科打诨,信口开河。

西行8公里,是1673年西班牙人移地重建的巴拿马城,现称第二古城。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仍是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古城格局、建筑风貌,都保存了17世纪的原生态,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各式建筑随处可见,所以在1997年“巴拿马城考古遗址及巴拿马历史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让我想起捷克的布拉格,整个老城在199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国内的老城改造还没有开始,像南京、天津、广州的古城区都有条件争取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那个时候人们的认知中还没有这个概念。

来巴拿马不能不看运河。听导游介绍,我才知道巴拿马运河不是修在平原上,而是位于地貌复杂的巴拿马地峡中,河谷、沼泽之外,中间尚有26米高的山冈阻隔,需经过3组双向船闸抬升或降低水位,才能顺利通航,所以80公里的运河,要走约10个小时。但是相比南绕合恩角,航程要减少1万余公里,许多大型货轮宁愿交纳高达百万美元的过河费。太平洋一侧的第一坝是望花船闸,是位置很好的观览点。恰好下午2时40分会有一艘集装箱货轮过闸,我们赶在此前抵达。船闸旁有一幢新建的四层楼,连着观景台,但是观景台上已经挤满了人,登台的宽台阶上也人流不断,我只好在台阶上找了个视线较好的位置,看着前方的闸区水位渐渐降低,货轮被放进船闸。

筑坝翻水技术并不新奇,早在1800年前的东吴,就已经建成破冈渎,更为人熟知的是当代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巴拿马运河设计路线时,就考虑到山冈上可以建设大型人工湖加通湖,以足够的水源保障船闸运转。望花船闸宽仅33.5米,巨大的集装箱货轮几乎擦着闸坝而过,但两边6台牵引机保证了货轮的平稳前行。所有基础设施都是百年以前所建,新增添的只是一些电子化控制系统。这才是运河令人惊叹之处,以百年前的技术条件,美国工程师建成这样的运河,尽管不能算宽,但超越时代、领先世界,至今仍未落后,能让世界上绝大多数船只顺利通航。

巴拿马一年分为旱季和雨季,11月下旬已是雨季的尾声,货轮过闸之际,突然下起大雨,打伞也遮挡不住,只好匆匆转入观景楼中的影院,看介绍运河开凿历史的45分钟纪录片。在美国人之前,法国人实施的巴拿马运河方案,意图凿穿山冈以连接两洋。幸亏这一方案以失败告终,因为海流和潮汐作用,太平洋比大西洋海平面高,若太平洋的水以数米落差冲向大西洋,不但巴拿马这片陆地会化为乌有,地球生态也会受到重大影响。运河对于世界而言是交通枢纽,对巴拿马更是经济命脉,收取过境费用之外,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旅游业的兴盛。

题图为货轮经过巴拿马运河望花船闸。

只要你足够强大

陈鲁民

一位资深编辑在一个文学青年座谈会上谈道:只要你的文稿足够出色,自会抓住编辑的目光。编辑每日海量阅稿,经验丰富,往往看个标题、读几行字就能判断。倘若稿件未能刊发,不必急于埋怨编辑不识珠玉,应当沉下心打磨文字,精雕细琢。只要文章足够优秀,其灿烂光芒是谁也遮挡不住的。

一位演艺前辈也曾劝诫苦于久不走红的青年演员:只要你的演技足够好,角色足够精彩,艺德足够优秀,走红是早晚的事。

推及各行各业,道理相通。一个人倘若足够强大、足够优秀,即便阻力再大,困难再多,也会有机会脱颖而出。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大,不是略胜一筹、稍稍领先,而是出类拔萃、一骑绝尘,让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回望历史,韩信军事才能足够卓越,刘邦就筑坛拜将,托付兵权,让他统帅三军。诸葛亮足够智慧,刘备不惜三顾茅庐,恳请他出山相助。谢安才能足够优秀,即便隐居山林,朝廷也屡次征召;淝水一战大破前秦,守住东晋江山,不负天下期许。

近现代同样不乏例证。陈寅恪学贯中西,足够博学,虽无正式文凭,仍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钱学森学识超群,足够睿智,虽面临重重困难,依然能白手起家,创造奇迹,成为“两弹一星”元勋。跳水名将高敏实力足够过硬,因而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圈内甚至有人感慨,与高敏同处一个时代,是其他跳水选手的遗憾。

但这份足够强大从不是与生俱来,更非运气所赐。它来自千锤百炼的锻造,是日复一日勤勉耕耘的成果,需要水滴石穿的长久坚持,需要倾尽全力的持续付出。

有一则小故事耐人寻味。深夜古寺,两块石头闲谈。做台阶的石头抱怨:日日被人踩踏,辛苦不堪,而佛像高高在上,受人供奉,世道实在不公。佛像答道:当初雕琢之时,你只受寥寥几刀便成型;我却历经千锤击打、万刀刻画,一遍遍削去棱角,熬过无尽苦痛,才成了如今模样。凡足够强大者,皆如这尊石佛,承受远超常人的历练、牺牲与煎熬,才换来日后的光彩出众。

人人都希望卓尔不凡,有所建树,渴望变得足够强大。但要认清:所有耀眼的实力,都不会凭空而来。足够强大背后,是长久的磨砺、隐忍与投入,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如果畏惧雕琢的苦楚,不愿全力以赴,就只能甘于平庸,如同那块台阶石。

所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与其哀叹怀才不遇、遭人冷落,不如埋头自强,奋力精进,努力打磨自身。当你的实力足够拔尖,优势足够明显,让人无法忽视,便会发现前路豁然开朗,机遇接踵而至,所有的门可能都为你而敞开,遇到的都是笑脸,成功之神向你频频招手。

拾柴篇

万物教我轻轻地活

李子燕



我总觉得,日子不是被“过”出来的,是被露水、夕阳、落叶、星子和雪,一点一点“教”出来的。

秋晨出门,草尖上全是星星的碎片。羊群走过山坡时,露水打湿了人的裤脚。而我只用弯腰,就被一滴露珠收留了影子。它那么小,却装得下整座天空的蓝,也装得下我这个人。晨露仿佛在低语:“每一滴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我信。人活一辈子,说到底也就是一滴露——太阳一出来,有的诺言还没说出口,就变成薄雾了。可薄雾也不是白变的。有些东西不必永恒,晶莹过,就是答案。就像村口卖豆腐的阿姨,每年只笑两回,一回过年,一回孙子回来;不必说她寡淡,或者落寞,清清亮亮地活过,就够了。

到了山里,黄昏是另一本旧书。夕阳把群山染成一首用旧的词,倦鸟是最后一个韵脚,落在松枝上,连风都不好意思大声。溪水哼哼唧唧,唱给石头、唱给野花、唱给花里那只闭目养神的蜜蜂听。万物各安其位,不像人间,有时总急着争一个“我对你错”。如若坐在溪边,偶尔会感觉神奇,自己不过是一个颤音——短、乱、跑调,但真切。或许,有哲人会点点头:人本来就是天地旋律里最毛躁的那个音符,可正因为毛躁,才像活着的。人总不懂安顿,才老想着“去更远的地方”。

秋天一来,树就开始写信。叶子泛黄,不是生病,是赴季节的盛宴;凉风一敲门,它就离席,不去占着枝头那个空位。我默默写下一篇《与叶说》,里面的掌纹和叶脉,用的是同一种密码。我摊开手,真的——都是弯的、岔的、说不清主次的。大地写字不用钢笔,用枯荣;人心事重,也不过是另一片准备落下的叶。最妙的,是落叶飞舞的箴言:凋零不是结局,是另一种飞翔。从树的记忆里起飞,落进泥土的梦,等春天,会有人在一朵花里收到季节的回信。譬如我们的母亲,年轻时总怕花谢,可她自己就是那封被春天拆开的信:年轻时,红晕如霞;年老时,白发如雪;地址改了,邮差还是风。

秋夜静谧,一抬头,才知道自己多渺小。银河是天上一条走旧了的路,神祇都走没了,只剩碎瓷似的星光撒在那儿。完整多没意思啊,碗碎了才看得见釉下的纹路;远方没走到,才会在梦里反反复复地走。星夜私语,似乎在悄悄地说:残缺的星空比完整的好像更动人。人也是——没说出口的“喜欢”,没回去的故乡,没见最后一面的那个人,全在黑地里发亮。我合眼,把星空揉进梦,第二天醒来,枕头上像落了一层很薄的、天上的尘。

然后,雪就来了。雪是最不摆架子的哲学家。它一来,丑和美、高和低,全披同一件白袄。孩子们在上面疯跑,画些大人看不懂的音符;麻雀留下几个小字,寒风一念就散——像极了父母发的语音,啰唆,但传递温暖的牵挂。雪盖住一切,不是叫人遗忘,是教我们把“已经这样”当成“只能这样”。这是雪的教义。我念给炉火听:覆盖,是让一切重新变得可能。像一张白纸,等春天来落笔成诗。

我这半生,平凡而普通。露珠教我别贪长,黄昏教我别抢拍,秋叶教我别怕落,星空教我别求圆,雪教我:白茫茫一场,也不是空。

若问我活着靠什么?靠这些小东西:清晨一滴露珠,傍晚一声鸟鸣,秋后一片落叶,半夜一颗星子,入冬一场白雪。它们不开会,不发文,不卷,不怨,各在各的时辰里,把“存在”这件事,做得又轻又久。

有的人在草原捡牛粪、追兔子,知道活着要贴着地皮;有的人在漠河看雪花、送亡人,知道活着要往心里去。我没去过草原,没到过漠河,却也可以在狭窄的楼缝里,看草尖反光,看路灯替月亮值班。

这些就足够了。晶莹过,便不枉;各安过,便不亏;落下去,便还会飞;碎过,才配叫星空;被雪盖一次,才敢重新写一次。

今年冬天第一场雪,我真想迎风出去,把轮椅“走出”的印迹先写成一个“人”字,再让风读乱它。是的,不怕乱,大地从来不怕我们写错,它只怕我们不肯再落笔。

宋代画押见性情

胡亚萍



押字究竟起源于哪个朝代,一时很难考证清楚,不过在南北朝时已经有了,到了唐代就更流行了。安禄山不识字,据说他画押的时候,用三个手指撮一撮就算完事。

说到宋代的画押,就不得不提宋徽宗的御书花字。这种花字当然也属于花押,但因为皇帝身份特殊,所以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御押”。宋代十五朝御押的样式都留存了下来。其中宋真宗、宋神宗和宋光宗三位皇帝,御押都只画一个圈。皇帝每天要押字的公文实在太多,所以宋代皇帝多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印章,随手一印即可,免去了画押之烦。这种印章叫“花押印”,自宋代开始流行。

官员则把画押用于公务文告。宋代官场有惯例,不少进呈文书以押字为凭信,只画押而不署名亦可生效;但仅有签名而无押字,有时会被视为不合程式。正因如此,从宋初开始,官员进呈朝廷的文书往往只画押、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延续到宋孝宗时期,风气有变化,渐成押字与签名并用。多位官员联署公文,不少文书以居后为尊,官位越高押字越靠后,宰相押字常落在末尾。

工匠也会把押字写刻在工艺器物上,现存宋代文物中,很多漆器、瓷器上都留有工匠或窑户的押字。宋徽宗喜欢收藏书画,经装裱的书画,在卷轴拉开处常有一指宽的空隙,这上面往往有一行黑字题款,其中就有装裱匠的花押和名款。

宋代买卖田产时,如果当事人中有寡妇、幼子,他们若在契约上画押,必须有人亲眼看见其押字,并当场填写价格、亩数、年月、日期等。诉状也类似,宋代诉状有格式规定,结尾应写明上诉人姓名和画押;如果起诉人不会写字,就要由代笔人当众宣读,再由其亲自押上花字。

在宋代社会,押字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拯一生清正廉明,生前立下家训,严禁子孙做官时贪赃枉法,并明确交代:“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则家训后面也有包拯的押字。后来家训连同押字一起被刻成石碑,立在包氏堂屋中。这是家族内部使用押字的例子。

司马光的押字,只是署名时略作花写,很符合他为人周正的特质。王安石画押,只押一个“石”字:先一横,再一撇,中间加一个圈。王安石性子较急,往往把圈画得扁缩,一横只是轻轻带过。有人取笑他似押了个歹徒的“歹”字,也有人私下说他押的字像正反的“反”字,这当然是对他不满的人在贬损他。

大书法家米芾,人称“米颠”,任无为军长官时,在衙署里凿了一个池塘。入夏以后,蛙声聒噪不已。米芾便取来一片瓦,上面写了“墨池”二字,再押上一个字投进池塘,据说蛙声立刻停歇了。这方押字,真可谓风雅至极。

宋代画押已深入政务、工艺、法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既是防伪、授权、担责的制度工具,也是个人性格、风度与癖好的外化表现。

满庭芳